

文津出版

文史哲大系二五〇


近代詩經白話譯註的

興起與開展

朱孟庭◎著

國科會
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

補助出版



目 錄

自 序	01
第一章 緒論	1
一、研究緣起與目的	1
二、研究文獻的評述	8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18
第二章 白話文運動的推展與經典白話譯註	29
一、前言	29
二、晚清白話文運動與經典白話譯註 ——維新以保聖教、便幼學、便貧民	30
三、五四白話文運動與經典白話譯註 ——文學革命以重構經典	39
四、結語	44
第三章 教育政策的興革與經典白話譯註	47
一、前言	47
二、清末十年的教育政策與經典白話譯註	48
三、民初十年的教育政策與經典白話譯註	63
四、結語	78

第四章 疑古思潮轉變研究視角與《詩經》白話譯註……	83
一、前言……	83
二、五四——「從經學到文學」的確立……	84
三、文學研究與《詩經》白話譯註的關係發展……	91
四、結語……	113
第五章 疑古思潮解構經典地位與《詩經》白話譯註……	117
一、前言……	117
二、疑古思潮解構《詩經》的經典地位……	118
三、解構經典地位的正作用力 ——譯註多闡發情詩或情思……	131
四、解構經典地位的反作用力 ——譯註對舊說的承繼與修正……	143
五、結語……	152
第六章 疑古思潮建構文學性質與《詩經》白話譯註……	157
一、前言……	157
二、以多元視角欣賞詩藝——對譯註內涵的影響……	158
三、視《詩》為樂歌、歌謠——對譯註文體的影響……	170
四、以諷誦涵詠體會詩意——對譯註方式的影響……	178
五、結語……	198
第七章 胡適《詩經》新解對傳統的繼承與創新 ——以〈周南新解〉為論……	203
一、前言……	203
二、胡適新解《詩經》的理念……	208

三、〈周南新解〉的注釋·····	214
四、〈周南新解〉的說解·····	230
五、結語·····	244
第八章 結論·····	249
參考書目·····	259

表 次

表一：癸卯學制各級學堂教授經典一覽表·····	52
表二：郭沫若《卷耳集》改變詩體形式譯《詩》一覽表·····	192
表三：胡適〈周南新解〉闡釋的方式、對象、成效一覽表·····	242

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緣起與目的

儒家的經典是傳統中國學術最根源、最重要的基礎，徐復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中即明確指出：「經學奠定中國文化的基型，因而也成為中國文化發展的基線。」¹同時從《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敘》所謂「經稟聖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及「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²的權威性陳述，更可看出經典在傳統中國具有不容置疑的學術高位與絕對規範的價值意義。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學定於一尊，在儒家經典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經學，在古代傳統中國文化中長期居於主導地位，對於傳統中國的政治、學術、文化教育、民族精神和社會風貌等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³而其中又以《詩經》對中國傳統學術的影響最為廣泛，如章學誠即認為後世之文體備於戰國，且後世所有「言

¹ 徐復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自序》（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年），頁1。

²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敘》（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卷1，頁1。

³ 相關的論述，詳見吳雁南、秦學頌、李禹際主編：《中國經學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15~37。

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的著作，「皆本於《詩》教」，並且藉由「或曰」的設疑，說明三代以前和以後，「六藝惟《詩》教為至廣」的事實。⁴於今，對於傳統中國文化，我們須要有所反省，方能通古變今以符合時代的需求，而在步驟上，如同徐復觀在《中國經學史的基礎》中所說：「中國文化的反省，應當追溯到中國經學的反省」，至於經學的反省，則首先「便須有一部可資憑信的經學史」⁵，繼而在「可信」的基礎之上，使之更加「完善」。

從大方向來看，過去中國文學的研究多偏向作家、作品的研究，近年來也開始注意到「傳播」與「接受」的層面。1998年王兆鵬發表的〈傳播與接受：文學史研究的另兩個維度〉，就同時提到了傳播與接受這兩個視角對於文本研究的必要，他說：

文學作品從產生到其價值的最終實現，必須經過創作——傳播——接受三個階段，亦如一般商品所經過的生產——流通——消費三個階段一樣。因此，文學史研究，應該由作家——作品的二維研究逐步轉向作家——作品——傳播——接受的四維研究。⁶

此種研究方向的擴展，也當是《詩經》研究的理想目標。即

4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下》，收入《章氏遺書》（臺北：漢聲出版社，1973年），卷1，頁25、25、24，總頁13、13、12。

5 徐復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自序》，頁1。

6 王兆鵬：〈傳播與接受：文學史研究的另兩個維度〉，《江海學刊》1998年第3期，頁142。

《詩經》研究，除探討作者與成品表現的傳統研究外，還可以此二者為基礎，進而探討《詩經》本身及《詩經》研究者擴散、傳播與接受的情形。細分之，傳播與接受的著重點又有所不同，前者重在研究傳播本身的方式、途徑，以及傳播對文本解讀的制約與影響；後者則把重心轉向讀者，研究讀者的閱讀與接受。

探討經典傳播與接受的問題，可以從媒介與方式兩方面來看。首先，從媒介的角度而言，隨著時代、政治、社會、經濟、學術、教育、宗教、環境、風氣等媒介的不同，對於經學的意義會有不同的發現、不同的闡釋，所承認、接受的內涵也會有所不同。而這些差異形成的主要原因，又在於選擇的不同，一是選擇哪一經典做為傳承的主力；一是確定了某經後，選擇哪一家的說法或哪一本專著為解釋的依據。其次，從經典傳播與接受的方式而言，隨著時代的不同亦會有所更異，大體而言，「語譯」是為其重要的方式之一。經典語譯的目的是要幫助讀者解決閱讀原文的障礙，用讀者接受的語言直接閱讀經典，因此，「語譯」對於擴大經典的傳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追溯經典的語譯行為，最初應當是出現在教學場所中，例如孔子教導學生時，必然須要對傳授的經典進行講解，這種口頭的講解，就是一種以當代語言注解或翻譯經典的行為。其後，起於漢、唐，於北宋更加完備的「經筵」制度，朝廷做為「經筵講經」的講本，即所謂「經筵講章」、「經筵講義」或「講筵卷子」的帝王學經講義，以及「高頭講章」之類較為通俗的講解文字，也有部分可歸入此類經典語譯之列。惜這些語譯的成果由於文獻有闕，因此較難以掌握。從留存下來的相關文獻來看，例如宋代真德秀、明代程敏政、清代陳廷敬等文集

中，都留有相關的「講章」，還有將這類「講章」集結的書籍，大致也都是以當代通俗語言翻譯經典為說，雖然把解釋和翻譯混在一起，但本質上也可歸入語譯一類的作品之列。這類書籍如：宋代史浩的《尚書講義》、袁燮《絜齋毛詩經筵講義》、戴溪《續呂氏家塾讀詩記》；明朝徐善述教導皇太子的《尚書直指》，張居正教導萬曆皇帝而寫的那些「直解」一類的書；甚至清朝皇帝所謂「日講」一類的書，若是就其本質來說，大致也都可以歸於語譯之列。不過這些書籍都只是為了要教育皇帝或皇室成員而寫，語譯不夠徹底，翻譯的經典也相當有限，即使出版也並未引起太大的注意，因此就其功能、範圍與影響力而言，自然不能和近代所出現的經典白話註解、翻譯相比。此外，宋代學者為啟發童蒙，在一些經典的注本中，往往用接近口語的形式複述經意，朱熹《詩集傳》中即普遍採用此法，如〈王風·君子于役〉：「君子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於埗矣，日則夕矣，牛羊則下來矣。是則畜產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之君子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⁷此種以接近口語依序逐句複述詩意的解讀方式，可以說已具有翻譯的因子，但與近代對於《詩經》「詩化」的白話翻譯相較，在形質與數量上，均有顯著的不同。

近代出現的經典白話註解或翻譯本，就形式上而言，有單註，有單譯，也有註譯合一；就範圍而言，除《詩經》外，據筆者所知至少還有《易經》、《書經》、《禮記》、《左

⁷ 朱熹：《詩集傳》（題作《詩經集註》，臺北：華正書局，1974年），卷2，頁34。

傳》、《孟子》、《四書》等，其中尤以《四書》由於教育、宗教藉用的關係，因此翻譯的數量最多，其次則是《詩經》的譯註；若排除教育、宗教藉用的狀況，則以《詩經》白話譯註本的數量為最多。觀察當時各家出版社競相出版這類經典的白話譯註本，以及某些白話譯註本在幾年之內出版十多版，或者一再翻印的實際表現，則可知其傳播狀況的熱烈。⁸

與前代的經典語譯相較，由於時代環境、學術思潮與讀者對象等的不同，經典語譯產生的原因、動機，及其後蓬勃發展而成為一種「潮流」的本質、表現等也會有所不同。近代經典的白話譯註，從本質上而言是一種準備面對所有願意閱讀經典，然程度較為不足者而寫的書籍，此即是與傳統譯註最為顯著的不同。因為早期的語譯主要是針對特定的對象，即使是高頭講章之類或《詩集傳》之屬，也並沒有如此面對全民而寫的動機，因為在中國傳統教育觀念與制度中，主要抱持的是一種比較偏向「菁英教育」的觀點，並沒有近代以來民主社會「全民教育」的理想。郭沫若於〈古書今譯的問題〉一文中曾預估：「古文今譯一事也不可忽略，且於不遠的將來是必然盛行的一種方法。」並指出：「整理國故的最大目標，是在使難解的古書普及，使多數的人得以接近。」⁹這也正是近代經典白話譯註不同於傳統語譯的重要特點。

⁸ 如以江希張的《新註四書白話解說》為例，據筆者的考察，由九思齋出版、上海書業公所聯合印行的版本，至少有1921年、1926年、1928年、1937年等不同的版本；除此之外，萬國道德總會、上海育才書館、上海大公書局、上海錦章圖書局、上海大同書局、上海大陸圖書局、上海月明書局、上海六藝書林等，皆陸續有出版、印行。

⁹ 見郭沫若：《文藝論集》（上海：光華書局，1926年），頁97。

就今天的學習環境來看，經典語譯的形成本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但若是放在整個中國傳統學術發展的脈絡中加以觀察，或者放在經學史的角度進行探討，則其實際上涉及到許多相當重要且值得認真思考的學術問題，亟待進行全面、系統的考察。譬如何以《詩經》白話譯註的形成始於清末，其後便連續不斷的發展，至今仍長盛不衰？《詩經》白話譯註本的出現和繁榮是否有其必然性？《詩經》白話譯註的開展進程如何、其開展趨勢又如何？有無規律、軌跡可尋？尤其是在近代，此一白話譯註形成與開展的前期階段，其奠定了怎樣的基礎？《詩經》白話譯註與《詩經》研究結合的情形如何？是否能夠及時吸收《詩經》研究的最新成果並促進譯註水平的提高？等等。要正確回答這些問題，誠如趙沛霖於《現代學術文化思潮與詩經研究——二十世紀詩經研究史》中所說：「單靠個別譯本的舉證式研究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必須從時代學術文化思潮與學術史發展相結合的高度，密切結合《詩經》研究，將它作為一個具體的發展過程從整體上加以把握。」¹⁰近代逐漸興起的《詩經》白話譯註，是一種對《詩經》「詩化」的理解，因此，僅靠傳統訓詁考據的工夫是不足以完成的，更需要文化、教育、學術等相關條件的形成與觀念的變革始能完成。而這些因素直到近代方纔具備充足，故本書欲以此為研究對象，探討《詩經》白話譯註興起與開展的背景因素，及相關的譯註表現與學術意義，這不僅有助於近代詩經學史的瞭解，亦有助於對近代學術史的認識，更可綜合認知近代文化、教育、學術等的

¹⁰ 趙沛霖：《現代學術文化思潮與詩經研究——二十世紀詩經研究史》（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頁350。

發展與經典的密切關係，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議題。

此外，趙沛霖《現代學術文化思潮與詩經研究——二十世紀詩經研究史》中曾針對二十世紀《詩經》白話翻譯的部分，做了這樣的說明：

從 1923 年面世的第一個《詩經》白話文選譯本——郭沫若的《卷耳集》，到 20 世紀最後一個白話文譯本——2000 年出版的王延海的《詩經今注今譯》，在近八十年的時間裡，據不完全統計，共出版五十餘個《詩經》譯本（包括選譯本和部分作品的譯本），平均一年多就有一個譯本出版。《詩經》白話文譯本如此集中和接連不斷的出現，構成了 20 世紀《詩經》學園地的一道獨特的風景線，這一情況不但在數千年《詩經》研究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全部古典文學研究史上也從未有過，堪稱一大學術“盛事”。¹¹

《詩經》白話翻譯已有如此的盛況，《詩經》白話的註解，則是更為甚之，然則相關的研究卻相對稀少，誠如趙沛霖延續上文所云而發的感嘆：「與盛況空前的《詩經》白話文翻譯相比，有關的研究卻十分薄弱。迄今為止，只有極個別的論著對譯本做了一些具體論述，而且多為零星片段的研究。研究的過分『冷落』與譯本的長期繁榮相比，顯得極不相稱」¹²，本書研究近代《詩經》白話的翻譯與註解，即盼能補足此一被過分「冷落」的研究領域，且盼能由此做為一個基點，逐步建構出

¹¹ 趙沛霖：《現代學術文化思潮與詩經研究——二十世紀詩經研究史》，頁 349。

¹² 同上註。

《詩經》的白話譯註史。

二、研究文獻的評述

中國的詩經學，依照時間點來區別，大致可以分為「傳統詩經學」與「現代詩經學」。大體而言，「近代」¹³中國社會出現了結構性的重大變革，學術研究也出現了重大的轉向，勇於突破傳統的觀點相互撞擊，紛至沓來。對於過去詩經學的研究

¹³ 「近代」一詞，乃指接近於當今的一個歷史時代。近代和現代合稱「近現代」，但有時近代和現代並沒有截然的含義區別，可相互替代使用。且所謂「近代」的研究範圍，於不同時期、不同學者的著作中，時有不同的界定。如 1901 年梁啟超發表的〈中國史敘論〉，將「自乾隆末年以至於今日」稱為「近世史」（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 1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頁 453）；而龔書鋒主編的《中國近代史：1919-1949》（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則是以 1949 年為下限。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比較主流的時間區隔是從 1840 年鴉片戰爭到 1949 年，其後至當今，依序稱之為「現代」、「當代」，或合稱「現當代」，此乃是從歷史的角度所做的區分。至於「現代詩經學」，則是相對於「傳統詩經學」而言，是從學術史角度所做的區分，如夏傳才〈現代詩經學開端的十年〉中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揭開了現代詩經學的序幕（《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003 年第 6 期，頁 25），即是將「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的詩經學，稱為「現代詩經學」。夏傳才《詩經研究史概要·序》將《詩經》研究史分為五個階段，即先秦時期、漢學時期（漢至唐）、宋學時期（宋至明）、新漢學時期（清代）及「五四」及以後的時期。（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3 年，頁 3~5。）前四者即為「傳統詩經學」，後者即為「現代詩經學」。

究成果，已有學者對其存在的問題與解決的方案提出討論與反省。如洪湛侯《詩經學史》從整體《詩經》研究而言直指：「歷代《詩經》研究產生的失誤與成績相比，似乎失誤的損失還要大」，並歸納歷代以來《詩經》研究的失誤及其存在的問題有：「以說經方式解《詩》」、「《毛詩序》的積誤」、「門戶之見的危害」、「以科舉文章模式論《詩》」、「以史證詩常附會」、「以理說《詩》曲解多」、「繁瑣考證教訓深刻」、「標新立異往往誤導」、「庸俗社會學不可取」、「似是而非的模糊觀念是古今通病」等十項從古至今在研究上出現的失誤。其中，後四項「繁瑣考證」、「標新立異」、「庸俗社會學」、「似是而非」則是與現代詩經學相關的檢討。¹⁴趙沛霖《詩經研究反思》則專從大陸現代詩經學研究而言，認為其存在有：「因襲負擔沉重，傳統舊觀念影響深遠」、「視野狹隘，自我封閉」、「研究的起點低，低水平的重複多」、「以部分代全體，對多數作品棄而不論」、「庸俗社會學的傾向」等五大缺點。¹⁵楊晉龍先生〈臺灣近五十年詩經學研究概述（1949~1998）〉一文則歸納臺灣1949年以後，詩經學研

¹⁴ 洪湛侯：《詩經學史》（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下冊，頁825-833。洪氏提出的十點缺失，有部分值得借鏡參考，也有部分恐過激失當。如洪氏從文學研究為唯一正確的角度來批判傳統詩經學中的經學研究，又如其將明代中晚期出現的專為科舉考試服務的《詩》類著作，視為「一堆文化垃圾」等，這類說法均非持平之見。楊晉龍先生〈論清代臺灣詩經學的研究：方法及其可能性之探討〉中亦有所批評。此文發表於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第四屆國際暨第九屆全國清代學術研討會（2008年6月），見頁7。

¹⁵ 趙沛霖：《詩經研究反思》（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頁452-454。

究上出現有「專業精神稍有不足」、「研究內容猶有偏向」、「資料取用還可加強」、「批評態度不盡客觀」、「研究方法尚可商榷」等五大問題。¹⁶以上這些分析討論乃是從《詩經》研究表現的內容著手，另楊晉龍先生〈論清代臺灣詩經學的研究：方法及其可能性之探討〉中，從研究的預設與方法進行討論，指出現代詩經學有「以詩經學專著做為研究唯一根據的弊病」，且亦有將傳統詩經學與現代詩經學「概念的混淆而造成價值判斷錯誤的缺失」。¹⁷以上關於古今詩經學的檢討，尤其是現代詩經學的部分，須有充分的認識，方能做為日後接續研究的借鏡。

對於近、現代的詩經學研究，自八〇年代起，受到兩岸三地學者的多方關注，而有了較多的研究成果，根據林慶彰先生主編的《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12~1987）（1988~1992）（1993~1997），及寇淑慧所編，收錄 1901 年至 2000 年大陸香港地區發表的《詩經》研究文獻的《二十世紀詩經研究文獻目錄》可證。¹⁸陳文采《清末民初《詩經》學史》將這些研究的主要成果分為三大範圍：（一）詩經學史的論述而兼及民初領域者（二）清末民初《詩經》專門議題的研究（三）清末民

¹⁶ 楊晉龍：〈臺灣近五十年詩經學研究概述（1949~1998）〉，《漢學研究通訊》第 20 卷第 3 期（2001 年 8 月），頁 46~49。

¹⁷ 楊晉龍：〈論清代臺灣詩經學的研究：方法及其可能性之探討〉，頁 16。

¹⁸ 林慶彰主編：《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12~1987）（1988~1992）（1993~1997）（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89、1995、2002 年），寇淑慧編：《二十世紀詩經研究文獻目錄》（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 年）。

初詩經學者的專門研究。¹⁹本書在以上研究分析的基礎之上，進而探索與近代《詩經》白話譯註相關的文獻，以反省現今詩經學在研究模式、方法、內容等方面，尚有哪些待加強之處，以做為日後研究的指引與改進的參考，並彰顯本書研究的價值與重要性。對於近代《詩經》白話譯註相關的研究成果，約可分為以下三類：

（一）詩經學論述而兼及白話譯註的研究

此即在較大範圍的詩經學論述中，亦關注到白話譯註的部分，主要有：

1. 趙沛霖《現代學術文化思潮與詩經研究——二十世紀詩經研究史》，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
2. 洪湛侯《詩經學史》，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3. 夏傳才《二十世紀詩經學》，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
4. 陳文采《清末民初《詩經》學史論》，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年

對於《詩經》白話譯註研究著力最深的便是趙沛霖《現代學術文化思潮與詩經研究——二十世紀詩經研究史》一書，其有專章探討《詩經》白話文翻譯的問題，文中認為經學觀念的破除和大眾化意識的流行，乃是《詩經》白話文翻譯產生的前提，將《詩經》的白話翻譯分為「開創」（1923）、「討論和

¹⁹ 相關的研究成果詳見陳文采：《清末民初《詩經》學史》（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年），頁3~6。

探索」（1926—30年代）、「水平的提高」（50年代—60年代中期）、「多樣化」（80年代—世紀末）四個時期。分析肯定1926至1930年代有關《詩經》白話文翻譯的爭論，確立了《詩經》白話文翻譯的意義與必要性，以及《詩經》白話文翻譯的基本要求；同時肯定郭沫若《卷耳集》在《詩經》白話文翻譯上的開創之功，但也認為其偏離《詩經》意涵的譯法不宜提倡。此外，該書又立有專章討論現代《詩經》傳注訓詁的問題，認為其體現出科學觀念、文化視野、文學觀念、由繁趨簡的現代風格，其中特別發人深省者，如歸納現代文學觀念確立後，對於《詩經》傳注訓詁產生的四點變化：（一）除了解釋字詞的一般意義外，還要結合字詞釋義說明其如何「言志」和「緣情」。（二）特別要注意在詩歌形象建構中的作用和意義，揭示所蘊涵的形象因素。（三）對字詞的訓釋更加具體和精微，不只在實詞訓釋上如此，在語氣詞和助詞的訓釋上也相同。（四）文學作品的審美功能，不僅表現在思想內容方面，更體現在藝術特徵上，例如運用某些修辭和藝術表現方法等等。²⁰這些分析對於本研究具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雖然在某些論述中所舉的例證，多為現當代的專著，但提供的這四點變化特色，可以引發我們進一步探討，究竟這僅是二十世紀後期，現當代《詩經》譯註的特色？還是二十世紀前期，近代即已經存在的特色？或者是於近代即已奠定完成的基礎，因而造就了後來蓬勃發展的特色？這些引申的思考，對於本研究相關

²⁰ 趙沛霖：《現代學術文化思潮與詩經研究——二十世紀詩經研究史》，參見其第九章〈現代學術意識與《詩經》傳注訓詁〉及第十章〈大眾意識與《詩經》的白話文翻譯〉，頁307~388。其中有關於《詩經》傳注訓詁產生的四點變化之論，見於頁331~338。

問題的探討，頗具有啟發的作用。²¹

其次，夏傳才《二十世紀詩經學》，對於詩經學從傳統走向現代，及現代詩經學做了詳細的分期研究，於《詩經》文學研究的闡發，有助於對本研究背景的了解。其中亦有「注釋和今譯」一節，惜所討論的皆為八〇年代以後出版的譯註本；不過，其中的作者如陳子展於三〇年代即已發表了《詩經語譯》，2002年出版的《詩經直解》即在此基礎上累積精研而成的，²²可以由此稍見白話譯註形成與發展的軌跡。其三，洪湛侯《詩經學史》設有專章探討現代詩經學的相關問題，文中涉及二十世紀以文學角度研究《詩經》的產生背景、性質認知、體例變化；同時還從評論、注釋、今譯、鑒賞等四方面，分析評價二十世紀的詩經學專著，認為今譯的作者「都能從文學研究的角度出發」，今譯的工作「可以看作《詩經》文學研究深入普及的重要座標之一」²³，有助於對《詩經》白話譯註形成的認識。但分析評價的對象中，只有約略提及郭沫若的《卷耳集》，其成果固然有助於本研究背景知識的了解，但實

²¹ 根據車行健〈述往思來的學術對話——趙沛霖《現代學術文化思潮與詩經研究——二十世紀詩經研究史》讀後〉一文對趙書的評介，認為此書最值得稱道之處，「在作者具有強烈的方法意識與學科建設的企圖、開放的精神與廣闊的視野、高度的批判反省精神」三方面。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8卷第2期（2008年6月），頁225。而這三方面也正是研究現代詩經學所必須具備的研究要件，亦可做為本研究方法態度上的指引。

²² 陳子展《詩經直解》是其在三〇年代發表的《詩經語譯》，和五〇年代發表的《國風選譯》、《雅頌選譯》之基礎上，再經二十年精研而完成的全註全譯本，其逝世後於2002年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

²³ 此二句出自洪湛侯：《詩經學史》下冊，頁757、756。

質的功能並不大。其四，陳文采《清末民初《詩經》學史論》，從傳統目錄學的角度，分析討論了1888至1938年的五十年間，五十五位學者完成的一百三十餘種詩經學著作，探討清末民初詩經學的表現、淵源和影響，其成果對於此時期《詩經》研究概況的了解大有助益；當然，亦有助於本研究的進行。

（二）白話譯註專門議題的研究

此種類型的研究並無專著，而僅為零星的單篇論文，主要有：

1. 吳德鐸〈最早的《詩經》白話注本〉，《中華文史論叢》第8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0月
2. 程俊英〈詩經譯注四十年回顧〉，《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9年第5期
3. 李思樂〈小議《詩經》注譯的幾個問題〉，《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9年第5期
4. 吳培德〈《詩經》注譯中的幾個問題〉，《曲靖師範學院學報》，1992年第4期
5. 伍明春〈古詩今譯：另一種「新詩」〉，《福建師範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
6. 唐瑛〈隨意點染也譯詩——由郭沫若今譯《卷耳集》引發的一點思考〉，《郭沫若學刊》，2008年第2期

吳德鐸〈最早的《詩經》白話注本〉以七百多字介紹最早的《詩經》白話註釋本——錢榮國的《詩經白話註》，內容雖

過於簡略，但亦有助於本研究的溯源工作。伍明春〈古詩今譯：另一種「新詩」〉及唐瑛〈隨意點染也譯詩——由郭沫若今譯《卷耳集》引發的一點思考〉均是析論郭沫若《卷耳集》譯詩的表現，伍氏由此提出其對現代新詩的影響，唐氏則由此提出翻譯傳統經典詩文最恰當的途徑。至於程俊英〈詩經譯注四十年回顧〉，則是在回顧、總結《詩經》翻譯自1949年以後的四十年間的表現。李思樂〈小議《詩經》注譯的幾個問題〉則提出《詩經》譯註存在有：似是而非、語焉不詳、不求甚解、不科學的弊病，並提出譯詩的原則。吳培德〈《詩經》注譯中的幾個問題〉中則認為《詩經》譯註的弊病有：望文生訓、穿鑿附會、增字強解、臆改原文、濫用通假、誤解名物、不明語法、自相矛盾、譯文不順等，提出了商榷的意見，並說明修正的緣由。惜李氏與吳氏二人所檢討的對象，仍以現當代的譯註本為主，但仍可由此檢視近代《詩經》的白話譯註，是否亦有此些缺失。

（三）相關學者及其著作的研究

大體而言，對於《詩經》學者及其著作的研究，七〇年代以前，只能見到零星的書評，較具體的研究僅有四篇；八〇年代以後方才有顯著的發展，所發表的相關論著有百篇之數。²⁴其中，涉及近代《詩經》白話譯註相關學者的研究，且於專著中分章節個別論及者，主要有：²⁵

²⁴ 詳見陳文采：《清末民初《詩經》學史論》，頁5。

²⁵ 趙制陽《詩經名著評介》共三集，關於近代《詩經》學者的部分，

1. 趙制陽《詩經名著評介》共三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年；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3年；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
2. 趙沛霖《詩經研究反思》，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
3. 夏傳才《詩經研究史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

對於《詩經》白話譯註相關學者的專門研究主要有：

1. 王靜芳《胡適《詩經》論著研究》，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
2. 江永川《顧頡剛《詩經》學初探》，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
3. 胡幸玟《顧頡剛詮釋《詩經》的淵源及其意義》，暨南大學中語所碩士論文，2000年
4. 胡義成〈郭沫若與《詩經》〉，《西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2期
5. 丁亞傑〈顧頡剛《詩經》研究法論〉，《元培學報》第4期，1997年12月
6. 林慶彰〈顧頡剛與錢玄同〉，《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7期，2000年9月

第一集評介了聞一多的《詩經》論著，第二集評介了傅思年、古史辨學者的《詩經》論著，第三集評介了魯迅、郭沫若、錢穆、俞平伯的《詩經》論著。趙沛霖《詩經研究反思》則評論了俞平伯、聞一多、高亨、陳子展的《詩經》論著。夏傳才《詩經研究史概要》則評論了魯迅、胡適、郭沫若、聞一多等人的《詩經》論著。

7. 陳文采〈談談胡適與郭沫若的《詩經》新解〉，《國文天地》第22卷第10期，2007年3月

以上透過「述學」的基本工夫，²⁶以梳理、評述這些《詩經》學者的學術思想沿革及其論說的要點，當可從中爬梳相關於《詩經》白話譯註的成果與論點。此外，近代重要的學術、文化思潮——「疑古思潮」，及其中相關「古史辨運動」的研究，對《詩經》文學觀點的轉變與《詩經》白話譯註的興起，有重大的影響，相關的研究主要有：

1. 〔美〕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著，梅寅生譯《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民族主義與取代中國傳統新方案的探索》，臺北：華世出版社，1984年
2.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
3.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年
4. 章原《古史辨《詩經》學研究》，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04年
5. 林慶彰〈民國初年的反《詩序》運動〉，《貴州文史叢刊》1997年第5期

²⁶ 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導言》：「述學是用正確的手段，科學的方法，精密的心思，從所有的史料裏面，求出各位哲學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淵源沿革，和學說的真面目。」並認為「有了此番根本工夫，才方可達到哲學上明變、求因、批判的目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頁9）。然此種「述學」的工夫，不僅是用於哲學史的研究，亦是其他學術研究的基本工夫。

6. 郜積意〈「古史辨」《詩經》學的理論問題〉，《孔孟月刊》40卷1期，2001年9月

以上對於「古史辨」的思想淵源與內容方法多所析論，其中涉及《詩經》的部分如：林慶彰先生〈民國初年的反《詩序》運動〉，分析郭沫若與「古史辨」學者重新解釋詩篇之詩旨在反《詩序》運動中的角色與貢獻。郜積意〈「古史辨」《詩經》學的理論問題〉側重於「古史辨」學者的歷史觀念與研究方法，如何體現在其《詩經》學上，並對其《詩經》研究的問題進行檢討。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探討顧頡剛詩經學中反《詩序》的思想和其史料意義。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探討顧頡剛「歌謠」概念的淵源與內容，均有助於對疑古思潮《詩經》研究的了解。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綜合以上的諸多考察，大致可以粗略地歸結現代詩經學研究，在內容方面有以下四多四少：（一）論說研究多，實務研究少。對於二十世紀前期學術思維論說的探討較多，如反傳統、疑古思潮、國故整理、古史辨運動的探論較多；對於實際解詩，如譯註《詩經》的研究較少。（二）個案研究多，整體研究少。在實際解經的研究中，較多個別學者的研究，對於《詩經》論著專題的、綜合的整體研究較少。（三）對現當代的研究較多，對近代的研究較少。在個案的研究中，尤其是對

於《詩經》譯註方面，多著重在現當代蓬勃發展的研究成果，近代始創的研究成果較少涉獵。（四）主流學者研究多，非主流學者研究少。在近代個別學者的研究中，多集中於聞一多、胡適、顧頡剛、郭沫若、俞平伯、魯迅等主流學者上，中研院文哲所經學研究主持「民國以來經學之研究」研討會，雖已擴及黃節、朱東潤、林義光、張西堂、吳闓生、張壽林、劉師培、廖平、蔣善國、傅斯年等的《詩經》研究，²⁷但仍有為數不少的《詩經》學者及其論著湮沒而無人聞問。然就整體的學術了解，或者做為一種學術現象、風潮而言，這些曾經對經學教育與傳播盡過心力的學者或教育者，無論在學術上或教育上，理當具有不可抹滅的重要性，因此也就應當具有學術研究的價值。透過本研究的有效進行，以實務研究為主，論說研究為輔；整體背景因素的研究為主，個案譯註表現的研究為輔；近代為主，現當代為輔；並廣泛涉及主流學者與非主流學者，以發潛德之幽光等整體考慮的研究前提之下，所得研究成果，應可以彌補前人研究的疏忽或不足。

趙沛霖〈20世紀《詩經》學術史研究的兩種模式和方法〉一文中，從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上分析，認為二十世紀《詩經》學術史研究的大量論著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橫

²⁷ 2007年起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經學研究室，由林慶彰先生主持的「民國以來經學之研究」計畫，將民國以來的經學分為三個時期分段進行研究，即「民國時期」（1912~1949）、「新中國時期」（1949~）、「國民政府遷臺時期」（1945~）。前二者為中國大陸之詩經學，後者為臺灣之詩經學，至2010年止，針對「民國時期」之詩經學研究，共舉辦了八次學術研討會。2011年起至今，則針對「新中國時期」，共舉辦了二次學術研討會。

向「綜合型」的研究，即以時代和學者為考察基點，從不同時代，不同學者之間的學術觀點和認識的發展變化來梳理其整體邏輯關係和內在理路；一種是縱向「專題型」的研究，即以經過分類的作品為考察基點，通過梳理不同時代和學者對分類作品的觀點和認識的發展變化來揭示其邏輯關係和內在理路。趙氏認為兩種類型各有特點、優長和不足，若能將二者結合，取長補短，《詩經》學術史研究應會出現新的飛躍。²⁸依此，本書乃欲結合此二種方法，首先考察歷代語譯的發展情形，發現進入二十世紀的近代，《詩經》白話譯註的形質最為特殊，成果最為豐碩，影響也最為深遠，故選擇「近代的白話譯註」做為「專題」。首先，即以近代為主要對象，考察此一時代相關的各個層面，再細分為幾個「專題」來研究，梳理其中的發展變化、邏輯關係和內在理路。其後，則「綜合」各個專題，以明其整體的發展、變化之況。

至於本書探討《詩經》白話譯註的興起與開展，當從哪些「專題」來研究？誠如趙沛霖《現代學術文化思潮與詩經研究——二十世紀詩經研究史》中所說：「單靠個別譯本的舉證式研究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必須從時代學術文化思潮與學術史發展相結合的高度，密切結合《詩經》研究，將它作為一個具體的發展過程從整體上加以把握。」²⁹故知此一議題應與當時重要的各個層面，如文化、教育、學術等的新興與變革，有著密切的關係。本書即依序，分別從近代「白話文運動的推展」、

²⁸ 趙沛霖：〈20世紀《詩經》學術史研究的兩種模式和方法〉，《貴州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4期，頁77-82。

²⁹ 趙沛霖：《現代學術文化思潮與詩經研究——二十世紀詩經研究史》（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頁350。

「教育政策的興革」，以及「疑古思潮」之「轉變《詩經》的研究視角」、「解構《詩經》的經典地位」、「建構《詩經》的文學性質」等背景因素的影響，來探討《詩經》白話譯註是如何興起與開展的，以及析論其相關的成果與表現等傳播與接受的情形與學術意義。此外，並以較早從事《詩經》譯註的古史辨學者胡適為例，解析其較完整的譯註成果〈周南新解〉，以再次說明此時期《詩經》譯註的理論與實務，理念與特色，成果與限制等學術意義。最後，再綜合各專題的研究，以對近代《詩經》白話譯註的興起與開展有一整體的了解。

未來，可依前所述模式，再繼續從縱向的擴展來看，探討現當代白話譯註接續發展的情形。如此，對於各個時代、各個學者、各種層面，依所需進行比較、歸納、綜合、分析，應可對此一時代和學者的學術成果、貢獻和特點，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此整個過程，簡言之，就是：將經過充分研究的各個「專題史」通過整合而成為「綜合史」；又將各個「綜合史」的研究整合為「專題史」。如此把「綜合史」與「專題史」的優長集於一身，並反覆融合而形成的《詩經》學術史的研究，誠如趙沛霖所云是「完全超越了其前身，而成為一種全新形態的《詩經》學術史」、「不但徹底擺脫了片面性，而趨於全方位和立體化，而且突出了《詩經》的文學性和《詩經》學術史的文學研究史性質。」³⁰是以期能藉由本研究的有效進行，以逐步建置經學史、詩經學史，乃至於學術史的研究，使之更加趨於「可信」且「完善」。

³⁰ 趙沛霖：〈20 世紀《詩經》學術史研究的兩種模式和方法〉，《貴州師範大學學報》2004 年第 4 期，頁 82。

在研究的對象方面，本書以近代有意識地使用「白話文」來注解或翻譯《詩經》的著作為研究對象，包括此時期出版的白話譯註專書及相關譯註的單篇論文。而本書雖以《詩經》為研究對象，然當時經典的白話譯註乃是普遍的整體現象；因此，有時問題的思考不能侷限於《詩經》本身，而應擴及整體白話譯註的情形，故依各專題之所需，其他經典的白話譯註亦會一併加以討論。³¹須進一步釐清的是，近代仍以「文言文」來注解《詩經》的著作，及以「白話」論述《詩經》學而非譯註形式的著作，均非本書研究文本的對象。

在研究時間範圍的設定方面，就目前所知，最早的經典白話譯註本為上海彪蒙書室於 1905 年出版，由王有宗、施崇恩合演校訂的《繪圖四書速成新體讀本》³²；在《詩經》方面，最早印刷出版的《詩經》白話譯註本，是清光緒 34 年（1908 年）江陰縣禮延高等小學堂出版的錢榮國《詩經白話註》一書。³³合理的推測，其出版之前應當已在學堂講授，因此起始

³¹ 如本書第二章從「白話文運動的推展」，第三章從「教育政策的興革」來研究，其一，二者影響的範圍與整個經典的譯註密切相關，須一併探討；其二，二者影響的時間點為經典譯註的初期階段，經典譯註的數量較少，可一併探討。故本書第二、三章乃擴大析論此二大背景因素，對「整個經典」白話譯註興起與開展的影響。此二章所研究的時間範圍，為經典譯註興起與開展的初期階段，約為 1900 年至 1922 年。（詳見本書第二、三章）至二〇年代疑古思潮的多方衝擊之後，經典譯註開始蓬勃發展，譯註數量增多，本書則改為專事於《詩經》譯註的研究。

³² 由於其中對經文進行經義的演繹與闡釋，故稱為「合演校訂」。

³³ 據吳德鐸〈最早的《詩經》白話註本〉所稱，錢榮國《詩經白話註》為中國「最早的《詩經》白話註本」。此文見朱東潤主編《中華文史論叢》第 8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頁

時間應稍往前推移，故本書研究的時間起於清末實行「新政」的最後十年左右（1900 年左右），直至疑古思潮古史辨學者熱烈論辨後的 1930 年代，³⁴前後約四十年左右的時間，偏重的是清末民初「變」的部分，以探討近代《詩經》白話譯註史的前期階段，其興起與開展的背景因素，以及在此背景因素的影響之下，所形成的譯註表現與學術意義。³⁵

據筆者的考查，目前所知 1900 年至 1930 年之間《詩經》白話譯註的出版，單篇論文大多收錄於《古史辨》第三冊中，專著則依序計有以下十四種：³⁶

112。

³⁴ 《古史辨》由顧頡剛等人編輯，於 1926 年至 1941 年陸續出版七冊。其中第三冊收錄了大量《詩經》論述的文章，出版於 1931 年，故《古史辨》對《詩經》譯註較為直接、即時且具體的影響，可論及 1930 年代。

³⁵ 由於本書著重於背景因素的分析，故行文中，特別詳明事件生發的時間點，有時年、月、日皆詳載，雖不免過於繁複，然為能順利推論背景因素與白話譯註之間的因果關係與發展過程，仍選擇以此方式行文。

³⁶ 以下所標出版者、出版年月，乃為首次出版的情形，並非等同於本書所使用的版本。筆者於〈二十世紀前期《詩經》白話註譯的形成——以研究視角的轉變為例〉一文中曾統計 1926 年至 1949 年後出版的《詩經》譯註專著有二十五種（見世新大學中文系主編：《第三屆兩岸韻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理論與批評》，2010 年 12 月，頁 98-99），然後經仔細研究，部分非運用白話，而仍為文言的語法；部分非「譯註」的專著，而是研究、論述的型態，皆予以刪除，得十五種，再刪除非本書研究範圍者，即 1947 年由重慶桂林新生書局出版的何澄平編述《詩經白話解》、1948 年由長沙續續書局出版李裕光的《（文言對照白話詳註）詩經註解》、1949 年由上海方言出版社出版倪海曙的《蘇州話詩經》，及可能為重複羅列的唐崇輝《國語注解詩經》（詳見下文註 39）四種。另又補列 1900 年

1. 錢榮國：《詩經白話註》，江陰：禮延高等小學堂，1908年
2. 未標明作者：《詩經白話註解》，上海：茂記書局，1918年
3. 郭沫若：《卷耳集》，上海：泰東圖書局，1923年
4. 許嘯天：《（言文對照白話詳註）分類詩經》，上海：群學書社，1926年³⁷
5. 洪子良：《新注詩經白話解》，上海：中原書局，1926年
6. 汪靜之：《詩經選註》，上海：暨南大學印行講義，1928年³⁸

至 1925 年間出版的錢榮國《詩經白話註》、未標明作者《詩經白話註解》及郭沫若《卷耳集》三種。故就筆者目前的查考，1900 至 1930 年代的《詩經》白話譯註本，總計有十四種；其中，汪靜之《詩經選註》，筆者目前尚未能見及原書。

- ³⁷ 本書之書名，於封面標為「（言文對照白話詳註）分類詩經」，內頁則標有「（言文對照白話註解）新式整理分類詩經」、「分類詩經」二種書名。此時期經典白話譯註本，時有此種一書於不同處、不同版次標為不同書名者。
- ³⁸ 參見陳漱琴：《詩經情詩今譯·序二》，汪靜之於為其所作之〈序〉中，曾提及自我《詩經選註》印行的行情（《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 1 輯第 35 冊，頁 11。）又陳漱琴《詩經情詩今譯》中收有汪靜之〈王風·大車〉、〈鄭風·遵大路〉、〈鄭風·褰裳〉、〈陳風·澤陂〉四詩的譯註，由汪靜之為《詩經情詩今譯》所作的〈序〉中亦可推知，此四篇譯註應即摘自汪靜之的《詩經選註》，其云：「我在暨南大學教《詩經選註》時曾把這篇文章（〈大車〉）的意思在講堂上說過」（《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 1 輯第 35 冊，頁 8），且〈序〉文中對〈大車〉所做的解釋，與《詩經情詩今譯》書後所收汪靜之對〈大車〉的解釋相同。汪靜之《詩經選註》目前雖未能見及，然由此亦可略見其梗概。林慶彰先生主編：《民

7. 喻守真：《詩經童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1932年
8. 陳漱琴：《詩經情詩今譯》，上海：女子書店出版，1932年
9. 江蔭香：《詩經譯註》，上海：廣益書局，1934年
10. 陳子展：《詩經語譯》，上海：太平洋書店，1934年
11. 縱白踪：《關雎集》，上海：經緯書局，1936年
12. 唐笑我：《（言文對照白話註解）詩經》，上海：啟智書局，1936年³⁹
13. 鍾際華：《（新註白話解）詩經讀本》，上海：大文書局，1936年⁴⁰
14. 繆天綬選注：《詩經選讀》，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

至於本書必須擴大於其他經典白話譯註本的章節，如「白話文運動的推展」與「教育政策的興革」部分，也就是 1900

國時期經學叢書》，臺中：文听閣圖書有限公司，此叢書第 1、2 輯出版於 2008 年，第 3、4 輯出版於 2009 年。

³⁹ 本書之書名，於封面標為「（言文對照白話註解）詩經」，內頁則標有「（國語解釋）詩經」、「詩經」二種。筆者查考資料，於「中國詩歌網」之〈詩經研究論著索引（1931 年—1941 年）〉中見有唐崇輝《國語注解詩經》一書，亦為上海啟智書局於 1936 年出版，（<http://www.poetry-cn.com/?action-viewnews-itemid-60462>）然筆者尚未能見及此書，也未見有其他著錄的資料，而唐笑我《（國語解釋）詩經》與唐崇輝《國語注解詩經》，在作者名、書名上均極為相近，且出版社、出版年亦皆相同，故於此暫不列入唐崇輝《國語注解詩經》，待日後資料更為詳盡時，再做考證、修正。

⁴⁰ 本書之書名，於封面標為「（新註白話解）詩經讀本」，內頁則標有「詩經白話解」、「新註詩經白話解」二種書名。

至 1922 年之間，其他經典白話譯註本出版的情形，⁴¹據筆者的考查，依序計有以下七種：

1. 王有宗、施崇恩：《繪圖四書速成新體讀本》，上海：彪蒙書室，1905 年
2. 陳國粹、守存甫：《圖畫四書白話解》，上海：彪蒙書室，約 1905 年⁴²
3. 施崇恩：《四書白話解》，上海：彪蒙書室，約 1905 年
4. 王有宗：《繪圖孝經新體讀本》，上海：彪蒙書室，1908 年
5. 江希張：《新註四書白話解說》，上海：書業公所聯合印行、萬國道德會等，1916~1921 年⁴³
6. 張鐵任：《四書白話旁訓新讀本》，廣州：孔教堂，1917 年
7. 費恕皆：《春秋左傳音義白話註解》，上海：群學書社，1921 年

根據以上的說明，本書乃以《詩經》白話譯註興起與開展的背景因素及其影響為主，譯註作品的分析為輔，即譯註作品的表現與學術意義，亦是在此些背景因素的影響之下，所進行

⁴¹ 參見本章註 31。

⁴² 據筆者的查考，資料顯示《圖畫四書白話解》、《四書白話解》均出版於《繪圖四書速成新體讀本》之稍後，然正確的時間無法確知，故二書皆姑且標為「約 1905 年」。

⁴³ 因本書乃陸續出版《孟》、《論》、《學》、《庸》的註解、說解，故標為 1916~1921 年，詳見本章註 8，及本書第三章之「三、民初十年的教育政策與經典白話譯註」，頁 69~73。

的分析，並不專就個別譯註作品做詳細的論述，故譯註作品的舉例說明，乃著重受背景因素影響較為顯著、較具代表性者，雖不免有所偏頗與不足，然應較能突出主題。至於此些個別譯註作品的詳細分析，本書僅以較能彰顯本研究主題者——胡適〈周南新解〉為例，其他則盼能留待日後繼續努力。